

全球史视野下中国海洋形象的国际传播

——评《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

符丹婷 (Fu Danting)¹

摘要：《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围绕高丽王朝与中国宋、辽、金、元、明初等政权之间的海上交往展开论述，涵盖外交、贸易、宗教与制度等多个维度，呈现出一个多中心、多层级的东亚海洋互动图景。作者以高丽为观察与叙述基点，借助多语种文献与制度细节，展现高丽在海洋交往中所体现出的适应性机制与文化回应策略。对中国读者而言，这种非本位化的叙述路径有助于突破传统史学的单一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在区域结构中的复合角色。本文在全球史的分析框架下，评析该书的论述逻辑与方法，指出其在回应朝贡体系研究、关注非国家行动者、展现区域文明互动层面等方面的史学价值。该书融合比较史学与跨文化叙事方法，为中国海洋史的多元范式探索提供了学理参照。

关键词：《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全球史；海洋叙事；国际传播

Title: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a's Maritime Image in Global History: A Review of *Maritime Exchanges between Goryeo and China (918-1392)*

Abstract: *Maritime Exchanges between Goryeo and China (918-1392)* conducts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seaborn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oryeo Dynasty and successive Chinese regimes—including the Song, Liao, Jin, Yuan, and early Ming—spanning diplomatic, commercial, religious, and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 It presents a polycentric and multilayered picture of maritime engagement in East Asia. Anchoring the narrative in Goryeo's perspective, the author employs multilingual sources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 elucidate the adaptive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strategies employed by Goryeo within maritime networks. For Chinese readers, this decentere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facilitates a breakthrough beyond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s single perspective, enabling a re-examination of China's multifaceted role within regional structures. Framed within global history, this review analyzes the monograph's argumentative logic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highlighting its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in three areas: advancing critical studie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foregrounding non-state actors, and demonstrating dynamic regional civilizational interactions. By integrating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with cross-cultural narrative methods, the work offers theoretical reference points for diversifying paradigms in Chinese maritime history research.

Keywords: *Maritime Exchanges between Goryeo and China (918-1392)*; Global History; Cross-Cultural Narratives of Maritime History;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¹ 符丹婷 (Fu Danting)，宁波大学海洋教育研究中心成员、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洋教育研究。
电邮：fudanting1998@163.com。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文化传播任务。讲述中国故事，不仅需要回望自身历史的深处，也需要倾听世界目光中的“他者中国”。从海外学者的研究中理解中国，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的历史视野，也是建构文明对话体系的重要一环。中国传统史学长期秉持以陆地为核心的叙事模式，将内陆农耕文明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轴，将海洋空间置于从属或边缘地位。然而，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等，则始终在通过海洋“认识”“记录”乃至“想象”着中国。正如刘东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序中所言：“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一、在“讲述中国”之外思考“如何被观看”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持续增强，国家形象塑造也在多层次推进。在文明对话与冲突交织的大变局中，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面临着深层次的认知博弈。正如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 2006, p.22）所指出的，“中国的自我认知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普遍认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与分歧。”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文化传播的策略上，也反映为“谁来讲述中国”“谁在观看中国”等问题。近年来，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这也促使学界愈发关注中华文化如何有效对外传播。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学、影视、医学等具体领域，主体上多聚焦于“留学生、华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机制”，策略上则多探讨“由政府主导走向多元参与的转型趋势”（吴增礼、吴慧长，2025, p.138）。立足“他者化”理论视野，探讨海外社会如何构建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结构的研究仍显薄弱。

中国学本身是庞杂的领域，几乎可以同国内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生对话，但它同时有自己的范畴，通过海外中国研究机构被固定下来。“它也不局限于地理中国的概念，而是具有了‘文化’‘文明’的意涵，中国这一区域内发生的事物都成为一种中国文化。”（张树华，2024, p.8）中国学研究是不同的话语生产机制下的知识型组合，关于何为真正的中国文化，没有标准答案。在丛书所构建的海外中国研究图谱中，从宏大叙事走向日常生活、从边缘人群观察制度逻辑，成为认识“中国”的另一种有效路径。“通过具体人物、事件、制度、文本的观察，海外中国研究逐渐打破国内学界的思维惯性，形成理论反哺与视野扩展的双重效应。”（王雅琪、庞慧敏，2025, p.46）

《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值得关注。李镇汉主要研究高丽政治史、高丽对外关系史、中韩关系史、海洋史等，所著的《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已收录于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中。全书聚焦于中国宋、辽、金、元、明初各政权与朝鲜半岛高丽王朝之间的海上交流与贸易，时间上涵盖五代十国至明初的四百余年，空间上以高丽王朝为地理基点，辐射东北亚海域及沿岸政权的互动网络。

全书结构严谨，共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总论”，以宏观角度分析高丽时代海上对外交流的历史背景、基本路径、物资流通体系与制度安排，着重梳理高丽如何构建和利用其“对中国海洋交往的战略性通道”。下编为“分论”，按照中国历代政权分别设章，考察高丽与五代十国诸政权、宋朝、契丹、金朝、元朝、明朝之间的海上交往特色，中间也提及高丽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交流和贸易，体现出政权更替与海上秩序转变之间的关联。

在《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一书中，高丽与宋朝的交流和贸易所占比重颇大，涵盖北宋和南宋两大阶段，与高丽王朝的中期发展几乎同步。这一时期，中朝之间的黄海航道日趋活跃，

商人贸易、僧侣往返、贡使来往等活动频繁，整个东亚海洋网络逐渐从碎片状走向结构化。在中国日常的海洋史教育中，对宋代海洋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市舶制度、泉州贸易或“海上丝绸之路”。因此，从高丽的视角切入，观察宋代海洋的历史层次与社会逻辑，不仅对丰富中国海洋史的空间感知和制度逻辑具有重要启示，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如何在当代国际传播中重构海洋中国的知识图景。

二、高丽-宋朝交往的结构性面貌

李镇汉通过梳理各国史书、碑铭文书、僧人行记等史料，试图勾勒一个由官方往来、港口制度、商人常驻与文化传播组成的海洋交往网络。书中，高丽与宋朝的海上往来不仅篇幅丰富、信息量密集，更体现出作者对海洋历史空间的整体性思考。

（一）官方交涉与制度安排：从“因贸易之行”到朝贡节制化

宋高祖赵匡胤开国之初，高丽“即遣使朝贡”，宋朝亦“向高丽派遣了册封使”以回应。两国早期交往以“外交承认”与“制度对接”的形式迅速展开。李镇汉指出，随着时间推移，“在宋朝内部，逐渐建立了对高丽关系的基本态度”，形成“以册封为基础，以朝贡为核心”的结构。然而，高丽方面并非一味顺从这一宗藩秩序，其对交往节奏与贸易权的自主调整也十分明显。高丽成宗时期，针对外交与贸易混同带来的内政扰动，朝廷大臣崔承老“上疏主张应节制与宋的交流”。《高丽史》卷九三《崔承老传》中有如下记载：“我太祖情专事大，然犹数年一遣行李，以修聘礼而已。今非但聘使，且因贸易，使价烦伙，恐为中国之所贱。且因往来，败船殒命者多矣。请自今因其聘使兼行贸易，其余非时买卖，一皆禁断。”高丽由此进入“对外交流国家管控阶段”，外交资源被视作“皇家资源”，须由中央集中调配。这类控制逻辑并未断绝对外接触，而是在制度上明晰朝贡与贸易的合法边界，为后面宋商常驻、港口开放奠定秩序。

（二）宋商入丽与民间商贸：往返航路中的常驻机制

尽管高丽政府对民间“非时贸易”加以限制，但宋人商船与商贾仍长期进出高丽港口，形成“常驻与轮替共存”的海上贸易机制。宋朝官员曾记载：“常有贩高丽者，大率甲番三只到丽国，必乙番三只回归，丙丁亦如之。”换言之，每年会有两三艘商船来往高丽。

宋商的来丽动因多样，“不仅是为了购买朝鲜半岛产的黄金、人参、黄蜡、麝香、纻布等”，更是“为获得对日本、契丹、大食、回鹘、东南亚诸国等国家难以获取的物资和珍宝”。高丽凭借其地理中介性与外交活动密度，成为宋商“获得异国之物”的跳板。文中以僧侣义天赴宋求法为例，详尽描述了佛经典籍、法脉谱系、修行方法如何通过港口僧社实现跨国转译。李镇汉还援引其他零散记录指出，宋代铜活字、历法知识、冶炼工艺等也通过僧侣、商人之手间接传入高丽。

同时，宋商与高丽王室之间也形成了直接物资馈赠渠道：“宋商将其随船携带的珍宝和书籍、大藏经等当作礼品进献高丽国王或权臣。”这种赠礼行为超越了市场交易范畴，成为文化传播与政治示好的复合性行为，也为后来的印刷术传播、书籍编译等活动打下基础。

更重要的是，宋商在高丽港口的停泊并非短期行为。文中指出：“宋商云集于高丽西海岸的礼成港、可居岛、马岛、群山岛等岛屿以及忠清道沿岸，形成驻扎带。并不是来了马上就回国，而是在高丽长期居住与高丽商人进行贸易。”此处的“驻扎带”概念具有空间史意义，它标示出一套与官方港口制度平行运行的“商人生态空间”。这种驻留机制并未受到国家限制，是高丽地方层面对外商群体

的“默许性吸纳”的一种表现。

（三）港口与海岛空间的制度性组织：礼成港的双重角色

礼成港是高丽王朝唯一开放给外国商船的官方港口，其空间制度与管控逻辑在书中得到详细刻画。“在礼成港设立了负责接待外商的机构——客馆，其功能是在宋商靠岸时，安排其住宿和饮食等事宜，并作为外国商人和高丽商人之间的媒介。”“客馆制度”使得外国商人未必直接面对本地市场，而是通过礼成港行政体系“筛选进入开京市场”。书中强调，宋商若想与高丽王宫或贵族交易，必须“经过许可才能进入开京”，而大部分商人则只能“在礼成港或岛屿与高丽商人交易”。

此外，针对外商滞留带来的风险，高丽政府亦设立监管机制：“高丽派御史台官员对在岛屿靠岸的外国船舶的货物进行登记和检查，以便监视其出入。”这一制度可以防范走私、确保财政征税，同时也构成国家对港口空间的治理机制。

尽管高丽实行“唯一港口开放”政策，礼成港的地位却非封闭性的“控制港”，而是一个向岛屿、内陆、市场流动的网络枢纽。作者以“次级接触”“边缘对话”描述这种“半开放一半管控”的空间结构，说明海港既是海洋通道，也是国家调节国际流动的制度平台。

通过上述描写可见，高丽与宋朝之间的海上交往已不仅是朝贡体制下的礼仪互动，更是一个由外交制度、商贸常驻与空间组织共同支撑的区域交流网络。高丽王朝并未完全接受宋朝所构建的朝贡节奏，而是通过港口分级、接待制度与贸易策略灵活地维系其对外权能。宋商常驻机制、非制度化的海岛交易区与礼成港的制度建设，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多节点、多机制”的黄海互动体系。

李镇汉在本章节的写作中，体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首先，与传统以册封关系为主线的中韩史叙述不同，并未过度强调宗属身份，而是将朝贡、贸易、文化传播并置分析，强调高丽主动选择与空间再分配的权能。其次，作者高度依赖一手史料，重视文献细读，频繁引用《高丽史》《宋史》《实录》《传记》《碑铭》《使行录》等，在对使价贸易、海商停泊、港口网络等微观现象的复原中，采用比对性细读方法并配以大量图文描绘，体现了“结构微观史”的写作风格。最后，作者不仅讨论国家间互动，也描绘了海岛、港口、市镇、官道之间的互动，展现出礼成港不仅是港口，也是“国家与民间之间的接触界面”，由此推动了整个海洋社会的知识扩散与资源流通。

三、中国海洋叙事的另一种表达

在全球史的理论框架下重新书写中国，是当前史学研究的重要趋势。哈尔拉·福提斯（Gelina Harlaftis, 2010, p. 219）对全球史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全球史是不同文明间交流和互动的历史”。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并非文明故事的唯一主角，而是始终处于被联结、被对话、被塑造的互动体系中。从这一视角切入，海洋史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入口。葡萄牙学者阿梅莉亚·波罗尼亚（Amélia Polónia, 2010, p.14）也强调：“为了解全球动态，世界史学科需要纳入海洋史研究……海洋史能将地方、国家与全球联系起来。这是其最重要的优势之一。”

在这一全球史与海洋史对接的视域中，李镇汉的《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以其宏阔的时空视野与缜密的文献实证，勾勒出一个多层级、多边互动、动态生成的“海上东亚秩序”。高丽这一看似从属的国家，被赋予海洋中介者、文化再创造者、战略缓冲带等多重角色。而中国，在这样的视角中，也不再是孤立的“文明中心”，而是不断被观看、被转译、被折射的流动对象。这本书在写作风格上展现出鲜明的比较史学取径与全球史叙述方法，既使用大量中韩日等国一手文献，又关

注文化如何在流通中被重组、被误读与再创造。在写作中不执着于解释国家意图的统一性，而是揭示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制度底下被忽略的人群，如船工、译者、僧侣、商人，如何构成历史中的“无名海洋行动者”。

我们以往习惯从本土视角讲述中国海洋发展的历史，强调政策演进、制度创新、科技进步，然而，李镇汉的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中国海洋在历史上的另一种表达。如果不理解中国如何被纳入他国的视野与叙述，我们的“讲好中国故事”就可能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海洋不仅是贸易的通道或军事的前沿，它也是文化理解与认知的场所，是历史中无数普通人穿越地理、跨越语言、沟通信仰的公共空间。“海洋不仅属于国家，也属于世界；海洋不只是疆界，更是连接”；它不仅是国家战略的体现，更是一种文明间共同参与的叙事方式（成志杰、袁翠萍，2023, p.17）。因此，本书不仅是对高丽与中国关系史的重构，也是一次深刻的海洋观念史反思。到中国之外发现中国，中国海洋史不应只是“中国对世界的输出史”，也应是“中国如何被世界理解的历史”。中国海洋教育也不应只着眼于科技与制度建设，也要回到“认知方式”与“文化视角”的重构。

要实现这样的中国叙事，中国需要在“走向海洋”的同时，也要在观念上完成向“全球互动型海洋国家”的跃迁。“中国需要形成向海图强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共识，人类需要提高保护海洋的信心与勇气，这是最根本、也是最现实的需要。”（朱锋，2022, p.29）在这一进程中，历史研究所承担的角色不仅是提供过去的资料，更在于提供新的认知框架与思维路径。《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所揭示的高丽与中国海洋互动，正是在东亚区域史中激活全球史认知的一次有益实践，它不仅是一段历史事实，更是一种叙述的可能性。它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在历史中如何被他者理解？又将在当下与未来，如何与世界共建知识体系与秩序结构？

结语

在全球史与区域互动的交织进程中，中国海洋的历史叙事与知识体系正经历深刻转型。中国史书写需直面双重命题：在讲述本土故事时回应他者视角，在坚持国家立场时理解文明互塑逻辑。李镇汉《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的价值不仅在于重构了一段海上交流历史，更在于提出了一种从边界出发、在互动中定位中国的路径。海洋作为文明交流的重要空间，天然具有超越国界、涵容属性的属性。在这种流动性与开放性之中，未来的中国海洋史写作，或许正需要更多基于多边交往、比较叙述与文明互动建构的实践，以此回应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历史叙事的构建命题，也亦积极参与全球知识秩序的重构进程。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Amélia Polónia (2010). “Maritime History: A Gateway to Global History?” In Fusaro & Polónia (Eds.), *Maritime History as Global History*.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4.
- 成志杰、袁翠萍（2023）：“建设海洋强国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中国海洋叙事的两个维度”，《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03）：17-25。

[Cheng Zhijie, Yuan Cuiping (2023). "Building a Maritime Power and Constructing a Maritim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Two Dimensions of China's Maritime Narrative in the New Era." *Journal of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3):17-25.]

李镇汉（2024）：《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宋文志、李延青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Lee Zhenhan (2024). *Maritime Exchanges between Goryeo and China (918-1392)*, translated by Song Wenzhi & Li Yanq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Gelina Harlaftis (2010). "Maritime History or the History of Thalassa" In G. Harlaftis, N. Karapidakis, K. Sbonias & V. Vaipoulos (Eds.), *The New Ways of History: Developments in Historiography*. I.B.Tauris: 219.

乔舒亚·库伯·雷默（2006）：《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amo. Joshua Cooper (2006). *China's Image: How Foreign Scholars View China*, translated by Shen Xiaolei et al.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王雅琪、庞慧敏（2025）：“文化镜思：‘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进路与文化效能考察”，《出版发行研究》（04）：46-53。

[Wang Yaqi, Pang Huimin (2025). "Cultural Reflection: A Study on the Publication Approach and Cultural Effectiveness of the 'Overseas China Studies Series'".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Research* (04): 46-53.]

吴增礼、吴慧长（2025）：“固化与突破：中华文化‘他者化’视域的形成与传播策略”，《南京社会科学》（03）：138-146。

[Wu Zengli, Wu Huichang (2025). "Fixation and Breakthrough: The 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of the 'Othering' Perspective on Chinese Culture." *Nanjing Social Sciences* (03): 138-146.]

张树华（2024）：“海外中国研究与世界中国观的塑形”，《人民论坛》（7）：8-12。

[Zhang Shuhua (2024). "Overseas China Studies and the Shaping of a Global China Perspective." *People's Tribune* (7): 8-12.]

朱锋（2022）：“海洋强国的历史镜鉴及中国的现实选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7）：29-41。

[Zhu Feng (2022). "Historical Lessons from Maritime Powers and China's Current Strategic Choices". *People's Tribune · Academic Frontiers* (17): 29-41.]